

女性参与:互构中的个体化进程^{*}

闵学勤

摘要 嵌入中国男权社会的女性参与,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式个体化迎面相逢,两者相互启蒙、互为因果。论文通过分析两届北京市政协提案中女性委员的参与频度和效度,发现十年间女性委员的人均提案总量、人均优秀提案数及优秀提案产出率均全面超过男性,且呈现“后起式”及“脱域式”的参与特征。这一高层次女性参与缩影显示,在女性参与总量不断递增、内容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治理内核的进程中,强调自我认同、突出自助发展的个体化浪潮与之互相推涌,即便前路艰险,但持续发展的态势已不可阻挡。

关键词 女性参与;个体化;互构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02-0055-07

作者简介 闵学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210046

如果说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的性别二元区隔有所消解的话,更多的女性参与机会和平台既是其因,也是其果。一方面,家庭规模的相对缩小让女性摆脱漫长的生育周期,有时间在和生活和工作之余唤醒自我、走出家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建构由粗放转向精细,滋生出越来越多对女性的需求,并且在全球化及互联网技术的共同催生下,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领域释放出前现代社会不可比拟的女性参与空间。

然而嵌入中国男权社会的女性参与,仍然难以挣脱弥散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规范以及性别歧视。无论在家庭角色扮演、就业创业的选择及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女性的“第二性”身份,意味着潜在的“性别麻烦”,即便作为参与主体,女性需要更多地投入,耗费更多的成本才能赢得与男性相同的存在感。不过这一切正遭遇席卷全球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崛起,即个体在自己的

日常世界和生涯规划中作为核心存在,并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支配其中的规律是: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男人。世界在“我”和被期待的女人之间,在我和被期待的男人之间分裂了。^①尤其对于女性,渗透现代性的个体化与被期待的女性特质、女性规范几乎背道而驰:个体化强调女性的自我建构、自助发展,而这一路径选择不再以两性关系及家庭为参照系,不再强调社会认同,女性跳出性别之网,以自我身份融入公共领域,也即更频繁更深刻的女性参与成为必然。反之,女性参与在量与质上的同时递增,也会不断强化女性的个体意识,激发她们从理念到行动的觉醒,从而直接推动个体化进程。需要厘清的是女性参与与个体化的不断互构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什么阶段,与西方个体化社会有何差异,未来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力,其演变趋势如何?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公民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评估体系研究”(13YJA84001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数据支持!

一、个体化与女性参与的相互启蒙

梳理西方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从个体化倾向、个体主义到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女性参与公共领域、女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的崛起一样,都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之久,其间个体化与女性参与似乎并未有必然的交集,但两者之间的互相启蒙、互相建构还是留下了不少印迹。

个体化理念的提出,通常都认为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进行风险社会解读时的副产品。其实滕尼斯在其《新时代的精神》和鲍曼在其《个体化社会》中对个体化都有各自的详解。前者认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个体化,它是指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发展”^②;后者将个体化理解为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做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③当然贝克对个体化的认知显得更为充分,这与现实世界的整体趋势呈现显性个体化不无关联,“这一趋势迫使人们为了自身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和指导的核心。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主张间——包括有关人们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或亚文化的问题——做出选择。事实上,我们也要选择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并接受由此而来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和形式的变化和分化,这与隐含在大群体社会(Large-group society)的传统范畴当中的思想是相抵触的,后者谈论的是阶级、等级和社会阶层。”^④归纳起来,从理论到现实的个体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五大特点:(1)个体化是对社会藩篱的挣脱,虽然个体均嵌入社会而生存,但社会变迁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机会,个人在生活世界的多次、长时期选择为个体化奠定了基础;(2)个体化强调自我认同,而不是社会认同,个体的展演超过社会生活赋予的意义,其原动力来自那些不太明白的自我力量,并撼动着自己的灵魂深处;(3)个体化是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或称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的表征^⑤,

社会变革摧毁了作为第一现代性表征的控制、确定性、安全等基本要素,而代之以脱域、不确定性和风险等第二现代性要素;(4)个体化的后果是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体良知或社会参照单位作为补偿,即不再是社会阶层代替身份群体的位置。对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来说,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⑥;(5)个体化带来的冲突是多方位的,既有的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社会交往、社会运行习惯,乃至国家威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个人风险与社会风险共存,也因此形成个体化与风险社会互构的格局。

表面上个体化映衬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倾向,并不单指女性自我的变迁。不过个体化进程与贯穿整个20世纪的女权运动,以及随之不断扩大的女性参与并非仅仅存在时间上的重叠,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启蒙。个体化理论从来都认为男女生活历程中的个体化倾向是有差异的。在以前的世纪里,女性的寿命正好用来生活社会要求的成活子女数目,这些女性任务今天在大约四十五岁就结束了。^⑦“为了孩子的生活”今天仅仅成为女性生命周期中一个短暂的阶段,紧接着一个平均三十年的空巢期为女性参与提供了时间保障。而世界经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也为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提供了契机,女性可以摆脱旧有的家庭归因角色,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而对男性来说,去过独立的生活与旧有的角色认同是一致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避孕、离婚或不婚、对教育和职业的参与等等,都在女性寻求独立和自我的个体化进程中不断被泛化。

同样,社会参与的性别差异,除了能够用社会经济地位(阶级)、生命周期来解释^⑧,还与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有关,而这些同样也影响着女性的个体化进程。上世纪延袭至今的女权运动,一直致力于女性身为人类应拥有完整权利,女性应和男性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就女性参与而言,相对于男性参与社会事务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有研究表明女性参与最多的是那些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具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⑨改变女性的弱参与和参与的弱影响,与激发女性追寻个体化人生一样艰难和步履沉重。

直至 2011 年,日本政府仍然在为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世界倒数第 12 而出台《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⑩ 动用国家资源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政治领域、科技领域。即便在中国,“普通女性成为城市社区安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女性在城市社区治理权力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⑪ 等等,女性从总体上似乎仍然无法摆脱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参与现状。当然步入全球化和信息化共同主导的 21 世纪,价值多元、信息共享以及科技支持使得现代性的扩展进入个人独立、社会开放的通道^⑫, 相比以往女性参与和个体化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两者相互推涌和彼此构建成为可能。

二、十年间女性参与的一个缩影

中国语境下的女性参与置于中国社会整体的参与图式中,近年来以个人或组织身份,小到社区公共事务、大到两会商讨的国家议题,关涉政治、环境、文化、教育等多领域,通过主动或动员的、常态或非常态的,以及线上或线下各种方式进行的社会参与正不断提升,但参与总量不足、合法化渠道偏少、参与中的公平性欠缺及各阶层合作困境^⑬ 等等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加之性别差异,女性参与似乎没有机会突围。不过来自北京市政协第十届(2003 - 2007 年)、第十一届(2008 - 2012 年)这十年间的委员提案数据显示,两届共有 1647 位各行各业的政协委员,其中 475 位女

性委员参与提案以及获得优秀提案的人均数全面超过男性(见表 1): 仅占总委员数 28.8% 的女性委员,两届分别贡献了人均 9.98 件和 9.76 件提案,超过占比近三分之二的男性委员人均各 1.50 件和 2.32 件;从提案质量上说,女性委员的人均优秀提案数两届分别超越男性委员 28.3% 和 34.8%,其中优秀提案产出率女性委员也是一路领先,两届分别为 7.72% 和 6.35%,均超过男性委员;从委员质量上说,获得优秀提案的人数,女性委员两届共有 189 位的提案入选优秀提案,占女性委员人数的 39.8%,而男性委员中仅有 30.4% 贡献了优秀提案。而且从第十届到第十一届,女性委员的人数、人均提案数、优秀提案数及优秀提案产出率在递增速率上均超过男性委员,且都通过了性别差异的卡方检验。女性政协委员参与提案,相对于男性委员从质到量的全面跃升仅是女性参与的一个缩影,政协委员比普通女性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成就及收入水平,并且在党派选择、行业界别话语权,以及相应的政治参与方面都有更高的平台,不过和同类型的男性委员相比,她们仍在人均学历较低、人均年龄较大、在单位没有职务或担任正职明显偏低的情形下提供了更高的参与频度和效度,至少表明当给女性以合法、通畅和平等的参与平台,女性的参与活跃度完全不亚于男性。

表 1 两届政协委员提案数及优秀提案数性别交叉表

届次	均数	男	女	总计
第十届 (2003 - 2007)	委员数	598 人(72.6%)	226 人(27.4%)	824 人
	人均提案数	8.48 件	9.98 件	8.89 件
	人均优秀提案数	0.60 件	0.77 件	0.65 件
	优秀提案产出率	7.08%	7.72%	7.31%
	获得优秀提案人数	194(占男性 32.4%)	100(占女性 44.3%)	294
第十一届 (2008 - 2012)	委员数	574 人(69.7%)	249 人(30.3%)	823 人
	人均提案数	7.48	9.76	8.17
	人均优秀提案数	0.46	0.62	0.50
	优秀提案产出率	6.15%	6.35%	6.12%
	获得优秀提案人数	162(占男性 28.2%)	89(占女性 35.7%)	251

如果将 1647 位委员的年龄分成五个年龄段: 40 年以前(1940 年以前出生)、40 后(1940 - 1949

年出生)、50 后(1950 - 1959 年出生)、60 后(1960 - 1969 年出生)和 70 后(1970 - 1979 年出生),

再看女性委员参与提案的高峰期,发现两届女性委员中50后(平均提案10.69件)和60后(平均提案10.31件)提案数的均值最高(见图1),也就是说第十届中44-57岁的女性委员、第十一届中39-48岁的女性委员贡献了最多的提案,这两个年龄段均为女性完成生育和养育期,事业也相对处于高位,精力仍较充沛,她们有心力、能力从家庭中做较多的抽离,更多地阅读社会、反思社会并试图通过提案来改变社会。而反观男性委员,第十届中的50后(平均提案9.55件)、60后(平均提案9.34件),第十一届中的70后(平均提案10.24件)贡献了最多的提案,也即从29岁到57岁接近三十年的生涯期中都有参与社会的最大潜能,而女性同样可以最大程度面向社会发光发热的时长不到二十年,如果仅从政协提案这一较小的参与版图看,女性充分参与社会的时长相对男性缩减至少十年。笔者特别将所有委员中任期内每年获得一个优秀提案,即一届中连续获得五个优秀提案的18位委员单独析出来,其中有5位女性(占女性委员的1.05%)、13位男性(占男性委员的1.11%),5位参与效率最高的女性全部是40后和50后,而男性委员中有7位60后已经成为参与政协提案的翘楚,女性参与明显呈“后起式”特征。女性由于更多承担家庭的生育和照料功能,影响其参与的时长,并进而有可能让女性丧失在生涯中后期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动能,如果社会不够开放、惯习不被打破、平台没有筑起,特别是女性自我的成长过早中断等等,就这样的后起式参与仍很难达成。

三、女性参与的个体化倾向

究竟是什么促使女性在履行社会性别赋予的职责之余,腾挪时间、敞开胸怀去拥抱社会、参与社会,即便这样的参与来得晚一些,而且从频度到深度都不逊于男性?不可否认,社会自身的开放是女性参与的重要前提,尤其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社会转型,女性可施展的空间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但如果没有女性自我认同、自我发展等个体化意识和行动的崛起,女性以个体身份充分融入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在今天个体仍是中国语境里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概念,缺乏西方所谓制度式个人主义的土壤,也就是说女性必须更多依赖个体的觉醒,才能促成参与社会的种种努力,或者说女性独自参与的进程也是不断个体化的进程。

对北京市政协提案十年数据库进行多元分析显示,女性委员参与提案的多寡、获得优秀提案的机率与女性个体的文化程度、单位职务、职称、所属政协界别、政协专委会均无显性关联,也即判别女性社会阶层的主要指标对女性参与无直接影响。进一步分析189位获得1个及以上优秀提案的女性委员,是什么可能影响到她们的提案被认同?将她们获得优秀提案赋值为1,未获优秀提案赋值为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在95%置信度下通过检验的仅有三个变量(见表2):“提案总数”(连续变量)、“党派”(1=中国共产党;2=民主党派;3=无党派人士)和“有无社会兼职”(1=有社会兼职;0=无社会兼职),结果表明提案总数越多、越是民主党派、越担负社会兼职就越有可能获得优秀提案。特别是社会兼职这一项, $Exp(B) = 1.443$ 意味着相对于无社会兼职的女性委员而言,若有社会兼职则她们的提案被标榜为优秀的概率是前者的1.443倍。就党派而言,相对于中共党员,若女性委员拥有民主党派党籍,那她们荣膺优秀提案的概率是前者的1.428倍,但无党派人士就不显性。而提案量若增加一个,获得优秀提案的可能性也增加0.167倍。这一组数据总体上呈现出这样的图景:女性委员的高社会阶层并不决定她可能会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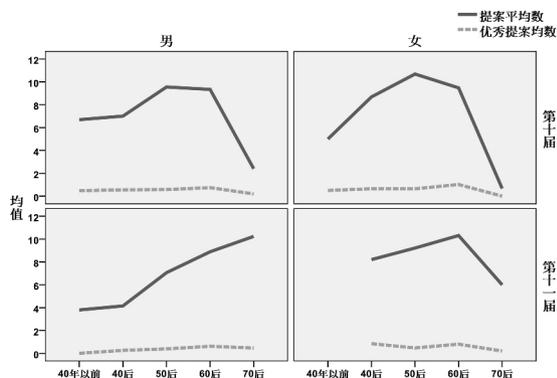


图1 年龄分层和性别对提案总数及优秀提案数影响的多重线图

是如果她不断地由量到质的参与,从提案总量的加大、参与单位之外的更多社会兼职、直至通过加入党派而提升参与的稳定性和组织化程度,那么她获得优秀提案的机率大大增加,也即对治理社会、改善社会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就成为可能。如图2,用上述二元 Logistic 回归保存下来的预测

值做 ROC 曲线显示,与凭运气五五开获得优秀提案相比(对角线),预测值曲线下辖面积达到 0.80(最高值为 1),在 95% 置信度下的估计区间为 (0.77 0.84),即加入提案总数、党派和社会兼职等三个参与维度判断女性委员获得优秀提案的效度要高得多。

表2 政协女性委员获得优秀提案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值	标准差	Wals 值	显著性水准	Exp(B) 值
提案总数	.155	.010	220.077	.000 **	1.167
党派 (参照组: 中国共产党)			6.198	.045 **	
民主党派	.356	.158	5.063	.024 **	1.428
无党派人士	.014	.156	.008	.930	1.014
有社会兼职 (参照组: 无社会兼职)	.367	.151	5.938	.015 **	1.443
常量	-2.347	.147	254.030	.000 **	.096

** 显著性水准 < 0.05, -2 对数似然值 = 51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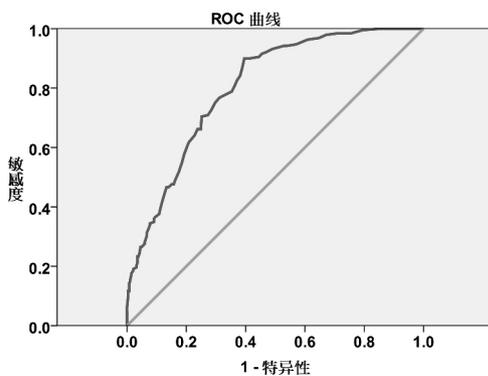


图2 二元 Logistic 回归预测优秀提案概率的 ROC 曲线

不依靠体制内职务、职称、专业委员会等资源,加大社会兼职、民主党派等现职以外的参与,也即不以单位身份,而是以个人身份融入社会被认同的机率更高,关于这一点在优秀提案的内容分析上也获得了支持。对 189 位女性委员提出的优秀提案进行议题分类,发现其大部分集中在文化教育、市政交通、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建设、三农问题、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这九大版块上(见表3)。笔者将属于九个版块 276 个优秀提案做了业内业外的区分,如果是女性委员在同一版块任现职时递交了提案并获优秀的,就将其列入“同行委员贡献优秀提案”,若优秀提案与女性委员所任现职无关列入“外行委员

贡献优秀提案”,发现所有版块的优秀提案以外行提供居多,其中外行贡献占比排前三位的有市政交通(90.2%)、环境治理(87.1%)和 社会保障(84.0%),分别都超过了 80%,此三个议题最近十年来备受所有政协委员关注,女性委员在单位现职视域外也纷纷加入其中研究、分析,并最终提出优秀提案,这种与单位无关、与行业无关,而与个体的社会兼职、党派选择及兴趣议题相关的“脱域”式参与,彰显了女性参与的个体化倾向,或者说女性个体化的演变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渗入女性参与,并有效推动着女性参与的发展。

表3 同行与外行委员贡献优秀提案的比较分析

行业分类	同行委员贡献 优秀提案数	外行委员贡献 优秀提案数	外行贡献 占比	总计
文化教育	24	35	59.3%	59
市政交通	5	46	90.2%	51
环境治理	4	27	87.1%	31
医疗卫生	12	16	57.1%	28
社会保障	4	21	84.0%	25
社会建设	6	18	75.0%	24
三农问题	7	14	66.7%	21
市场经济	6	14	70.0%	20
法制建设	5	12	70.6%	17
总计	73	203	73.6%	276

四、结论与讨论

从 2003 - 2012 这十年间北京市政协提案中

女性委员参与的缩影看,女性参与至少呈现三个特点:首先,女性参与正深入中国社会的治理内核,以三分之一左右的参与总量迸发出不可忽视的能量,她们无论在参与频度和参与效度上都不逊于男性,并且以一个独立的视角,而非第二性的视角观察、反思中国社会,提出自己的治理见解,她们因参与获得的认同对她们持续参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女性因社会性别赋予的及自身生命周期的特质,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中年及之后的社会参与有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水准,这种后起式参与在社会并未给予期待和关注的情形下,来势迅猛并汇聚成一股洪流影响着中国社会;再者,女性参与关注社会各项热点议题,其内涵的发散性已超出自己的单位、现职及行业属性,呈现出脱域式的个体化特征,女性在合适的时间点和开放的参与平台上以个体身份表达意见和建议已构成显性的演变格局。

虽然女性在政协提案这一高层次参与中的表现还不足以管窥女性参与之全貌,但如果女性在社会底层和中层参与的总量或深度不够,也就很难想象能支撑这样全面的女性高层参与。需要讨论的是女性参与之崛起在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女性个体化表征,或者这仅是社会发展及制度设计的必然?如果个体化对女性参与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由里及外,家庭身份、单位身份和社会身份不同层次的个体化,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女性参与?当然,女性参与不断兴起对个体化的推涌,即两者之间的互构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也非常值得探讨。

回答上述问题还必须回到中国式个体化特征上来。在西方个人权利和自由被视为是天赋的,并长久以来受到政治民主的保护,每个人的身份越来越多地由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平模式所决定,而不是受制于像家庭或阶级这样的社会团体^⑭,这样的制度化个人主义受到福利国家衰减的挑战,西方个体化的加剧与风险社会是互相推涌的。而中国人性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⑮,缺少制度式个体化的土壤。中国式个体化转型的显著特征是个体需要在与集体、政府或国家之间不断协商和抗争中获得,相比西方,在社会

不够壮大的前提下,家庭作为历史上个人和国家之间的重要中介,在促进个人身份认同的形式上比社会更具有影响力。^⑯如此推演,一方面中国女性的个体化在缺少文化支持和制度支持的氛围下发展,女性参与的广泛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个体化的路径之一,通过参与女性对自身和社会都增加了认知,她们在参与中意识到自我独立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了社会对个体的需求及包容;另一方面,中国式个体化的自我养成及家庭养成属性,更激发起女性参与组织、参与社会的渴望,并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断参与,形成参与的规模效应,让社会看到女性的成长及贡献,让制度设计能更加公平。因此,女性参与作为独特的中国式个体化中的一部分,个体化又为女性参与提供了理念及动能,它们之间的互构超越了时代的束缚和性别的藩篱,两者相互启蒙、相映成辉。

女性参与在个体化思潮的推涌下仍然要面对诸多的挑战:女性自身的生涯周期对参与意识和行动的干扰、女性获得参与的勇气和能量需突破家庭及社会的成见、女性如何从低层次参与更多地走向高层次参与、女性从积极参与走向主导参与如何实现等等。除此之外,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境况同时并存的中国社会,又遭遇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四面侵袭,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式个体化一样,女性参与被卷入多层次、多时空的复杂进程,多重互构不可避免,但参与的持续提升仍可乐观预见。

注:

①④⑥⑦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06—107、159、134页。

② 斐迪南·滕尼斯《新时代的精神》,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③ 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1页。

⑤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2.

⑥ Gans, Herbert J.,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A Re-evaluation of Definitions, in M. Rose (ed.),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 1962.

⑨ 吴小英《“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

- 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⑩周云《对日本2011年《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的解读——以政治领域、科技领域女性参与为重点》,《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3期。
- ⑪郭夏娟《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3期。
- ⑫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 ⑬阎学勤《行动者的逻辑——公众参与的阶层化与结构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 ⑭⑮贺美德、鲁纳编《“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许焯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页。
- ⑯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张维安、陈介玄、翟本瑞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3页。

(责任编辑:秦川)

Women's Participation: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with Inter-construction

Min Xueqin

Abstract: Women's participation embedded in Chinese patriarchal society is meeting the individuation head-on, the two is in the reciprocal enlightenment and causation. By analyzing the women's participating frequentness and validity in the two terms' proposals of Beijing CPPCC, the paper observed that proposals, good proposals and productivity of good proposals from per female council member fully exceeded per male council member's in ten years. It took on a latecomer developing and separate participating quality. The epitome of high-level women's participation displays that the participating total are at an ever increasing rate and the participating contents are constantly deepening in the core of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The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dividuation with self-identity and self-development form each other factor. Even if the road ahead is toug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endency.

Key word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dividuation; mutual construction